

跨越“陷阱” 唯快不破

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，造成悲观预期，投资、消费趋于保守，失业问题、财政问题、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，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，形成经济发展的“陷阱”。

文 | 黄志凌

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对 GDP 增速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，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，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 5% 甚至 3% 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
但我认为，不能把对于经济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个别指标，而有必要关注另一个重大战略问题——中等收入陷阱。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是世界银行在 2006 年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》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，它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，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，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这种长时期的发展停滞即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根据世行 2013 年新标准，人均 GDP 低于 1035 美元、1035~4085 美元、4085~12616 美元和不低于 12616 美元的四类国家，分别归为低收入国家、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。如果把 4085~12616 美元进一步划分，可把 4085~8350 美元归入中等收入，8350 美元~12616 美元则是中等偏上收入。

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较为容易，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的阶段，难度也相对可控，但从中等偏上迈入高收入国家，就相对比较困难。但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，大都会停留在这个阶段。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这个阶段当中。

识别降速风险

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很多，“二战”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、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、叙利亚等。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，随后长期陷入其中，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。

而成功迈过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则相对较少，国际上公认的仅有日本、韩国等国以及新加坡、我国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少数几个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。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了快速发展，并在在 15~20 年期间内，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。

按照国际经验，人均 GDP 长期徘徊在人均 1 万美元以下可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。有些国家，即便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，却很难入围高收入国家，这是因为，上述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、民主乱象、贫富分化、腐败多发、过度城市化、社会公共服务短缺、就业困难、信仰缺失、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。其中一些现象，在国内或已出现。

然而，国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，仍存在两种误区，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存在，二是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，环境、社会等问题将层出不穷、隐患不断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收入足够高的国家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遗留问题，而备受困扰的，恰恰就是未能实现高收入的国家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截至 2015 年年末，中国大陆人均 GDP 为 49228 元，约合 7600 美元。这一水平，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。即便如此，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新常态。那么，当真正的中等收入风险到来之时，压力将可想而知。

保持增长趋势

我国于 1997 年前后告别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，2013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6560 美元。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，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（12616 美元）也不变，在未来年均 7% 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仍然需要 10 年时间，8% 增速下则需要 9 年。

但不应高枕无忧地认为，届时，中国就一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，由于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创新不足，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建立速度效益，不仅是兼顾经济发展和市场结果，还是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筹兼顾的平衡方式。

定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。在历史上，一些国家的人均 GDP 曾短暂达到 12616 美元，但此后出于种种原因，这一指标又出现回落。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人均 GDP 需达到 12616 美元后，继续冲上 15000 美元左右，以留出 2000 美元左右的波动空间。实现 2000 美元的波动，需要等到 2028 年。

再进一步看，若要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，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，人均 GDP 需要达到 20000 美元左右，即有望在 2035 年实现。

无论是 2028 年还是 2035 年，前提都是在经济增速为 7%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6.6、人口不变的前提下。如果经济速度再下滑、人民币继续贬值、人口不断增长，中国晋级高收入国家的时间，还将被延后。

日本大约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，1970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940 美元，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，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 1972、1973 年前后。在这期间，GDP 增速年均均为 9.7%，其中 1955~1960 年年均 8.5%、1961~1965 年年均 9.8%、1966~1970 年年均 11.5%，1971、1972、1973 年分别为 4.7%、8.4%、8.0%。

在日本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，GDP 增速呈现两大特征：第一，速度很快，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 7~8% 的速度，要高一些；第二，速度并未见大幅降低，直至 1970 年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，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，但 1972、1973 年依然高于 8%。真正意义上的 GDP 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，而是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，1974~1980 年日本 GDP 年均增速降至 3.4%。

有人认为，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超过 10 万亿美元，经济增速或许不重要。但从经验上看，GDP 年度增速下滑的趋势，对于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并非利事。因为经济增速的快速下

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，造成悲观预期，投资、消费趋于保守，失业问题、财政问题、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，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，形成经济发展“陷阱”。

建立速度效益

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速，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、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。建立速度效益，不仅是兼顾经济发展和市场结果，还是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筹兼顾的平衡方式。

首先，必须注重规模平衡，高度警惕缺口风险。

进出口双双下降，其实就是缺口的一种反映。金融危机后，我国出口主体呈减少趋势，作为 GDP 的重要支柱之一，表现为缺口。既然外需不足，内需一定要跟上。之前启动内需 4 万亿，就是对于内需缺口的补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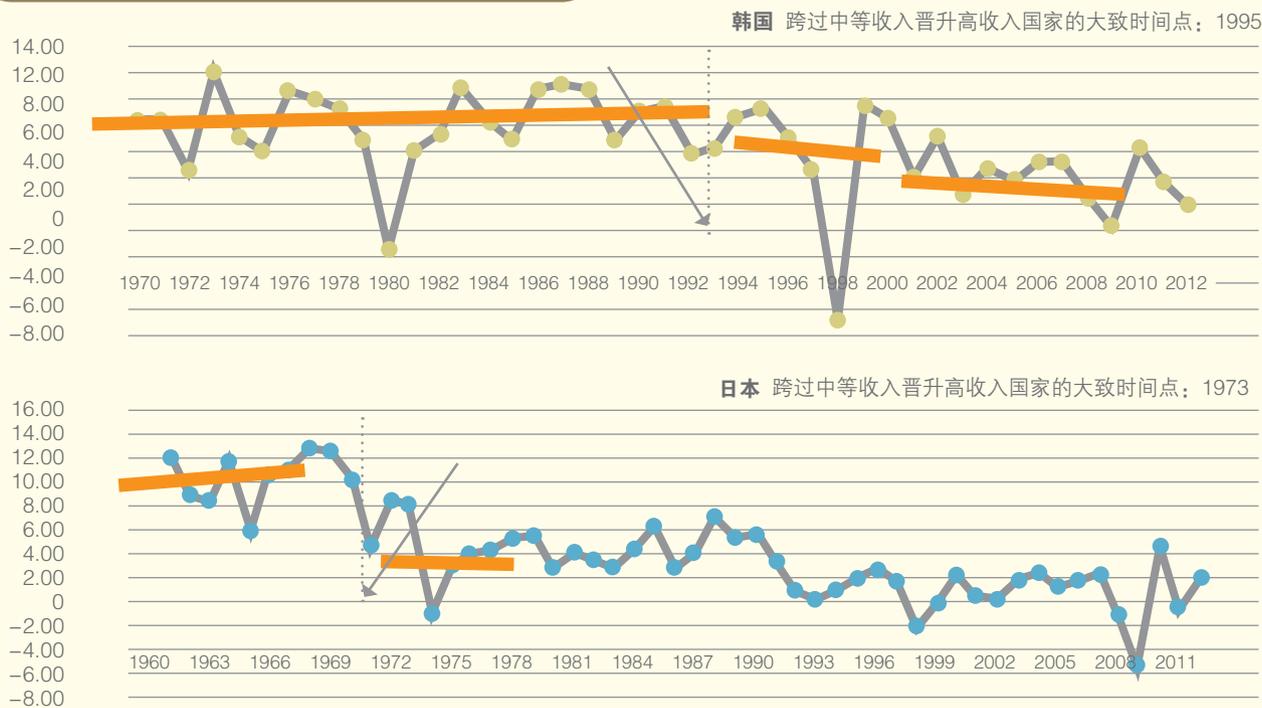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投资缩进也是另一种缺口。2010 年下半年，经济、房地产、股市都出现泡沫，投资增长率从 30% 回落到 20% 左右。在投资和出口面临双重缺口的情况下，必须要靠消费的力度来弥补。但实际上，2012~2013 年政府消费急剧减少，同时，民间投资活力始终未能被激发，直到 2015 年，民间消费才把政府消费的缺口补上。

第二，不仅要看重总量，更应注重结构。

如果一个国家的结构合理、块头又大，竞争力将更强。而当前，多数人更愿意关注经济总量，而忽视经济结构。比如，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。从总量上，一些行业的产能的确过剩，但从结构上看，很多产能其实存在短缺。因此，绝不能盲目地压缩产能、完成任务，而是应有保有压、有增有减，让结构更加合理。即便经济增速快一点，也不会出现大的泡沫或者遭遇经济翻车。

第三，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，即让传

韩国、日本历年 GDP 同比增速 (单位: %)



数据来源: Wind

统市场行为和政府预期之间形成一种再平衡。

在日本、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,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很大,但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,主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。在中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时候,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无可厚非。但我们应该在处理市场政策两者关系的问题上,更多发挥政府的力量。

美联储或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:2014年,美联储退出QE放出加息的信号,此后一年,加息始终没有实施,直到2015年12月,加息才真正实现。提前释放政策目的,即是给

市场预期,让其中的主体尽早准备。

回到中国市场,我们有时政策推出过快、过猛,会令市场措手不及。这种做法或许适合小型经济体,但已经不再适合中国。就像骑自行车和驾驶卡车,自行车体量小,刹车能立刻停下,蹬两下又能再次前进。但同样的力量,用在卡车上都不可能出现和自行车一样的效果。因此,政府应加强自身能力,提前释放预期,让市场尽可能地消化、预警新的可能出现的风险,保证市场对政策的适应和过渡。E

(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)